

十八世纪法国启蒙哲学 人本主义社会历史观述评

徐 瑞 康

一、对社会历史问题的说明, 是十八 世纪法国启蒙哲学的最重要方面

1789年,在西欧大陆的法国,当起义者们手执武器,攻打作为封建专制制度的象征巴士底狱时,在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法国大革命便宣告开始了。就整个欧洲来说,这是比之16世纪德国“宗教改革”运动和17世纪英国“光荣革命”要彻底得多的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第三次起义”^①。它最终抛弃了宗教外衣,毫不掩饰地在政治战线上作战;和广大的工人农民结成联盟,使消灭贵族的斗争获得了完全的胜利。它标志着新兴的资本主义制度在欧洲的牢固确立;震撼着当时的整个欧洲,影响着世界的发展进程。然而,考察18世纪法国这次革命的爆发,我们看到,它有着深刻的经济和政治的根源;并且在这之前,已有一大批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和哲学家在掀起一场理性的启蒙运动,宣传唯物主义,反对宗教神学和17世纪的形而上学,“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的头脑”^②了。在法国,若没有这样的哲学启蒙运动作“前导”,便不会有这样的政治革命的发生。

18世纪法国启蒙哲学经历了一个“进化的理论过程”。简扼地说,在17世纪和18世纪之交即启蒙运动的准备阶段,培尔用“怀疑论”作为武器来反对宗教神学和17世纪的形而上学,“在法国掌握唯物主义和健全理智的哲学打下了基础”^③,是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先驱。在18世纪即启蒙运动的掀起阶段,伏尔泰、孟德斯鸠、孔狄亚克和卢梭等各按自己的方式宣传了自然神论,把对宗教神学和17世纪形而上学的怀疑发展为对它们的批判,称它们是违反人类健全理智的“伪科学”。而自然神论在当时乃是唯物主义“摆脱宗教的一种简便易行的方法”^④。在18世纪即启蒙运动的高潮阶段,拉美特利、爱尔维修、狄德罗和霍尔巴赫等在继承17世纪唯物主义宝贵遗产的基础上,把唯物主义和战斗的无神论相结合,在更高的水准上继续驳斥着宗教神学和17世纪的形而上学。这种形式的唯物主义,因与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的编辑和出版事业相联系,又称“百科全书”派,是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最高成就和典型表达,在为法国大革命作舆论准备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而从理论内容上看,18世纪法国启蒙哲学则可分为两个相互交叉的派别:一派起源于笛卡尔,注重对自然事实的说明;一派起源于洛克,注重对社会历史的说明。众所周知,18世纪法国启蒙哲学在自然观上坚持自然是物质元素的组合,世界万物统一于物质的唯物观点;具有运动是物质的基本属性,“万象日新月异”,明显的感觉由“迟钝的感受性”演化而来等辩

证因素；尤其是用力学的观点解释一切，把物质的诸特性归结为广延、密度等机械性质，把物质的诸运动归结为物体的机械的位置运动，还把自然界视为“因果系列的无穷锁链”等等；适应着当时自然科学的总的状况，是机械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典型形态。它在认识上强调“在自然中把握自然”，热情地相信人类理性洞察自然奥秘的无限能力；与天赋观念论相对立，认为观念来源于对外物的感觉，一切精神活动都是对感觉的组合和比较；并含有“观察收集事实，思考把它们组合起来，实验证实组合的结果”等那样的辩证思想；是唯物主义感觉论发展中的鼎盛时期。

但是，必须指出，首先，18世纪法国启蒙哲学家之论述自然观，坚持从世界本身说明世界，乃是为把社会历史观从神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奠定唯物主义的基础；他们之论述认识论，并象对待一位久盼的客人一样热烈欢迎在英吉利海峡那边出现的洛克关于人类理性的起源的著作，也是为把唯物主义感觉论运用于社会生活方面。其次，适应着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现实需要，他们有许多专门研究社会历史问题的著作，包括那些有才华的无神论的文献；这些著作和文献蕴含有一整套以社会历史观为核心的社会政治伦理思想体系，其内容之丰富和观点之新颖，远较17世纪的唯物主义哲学为优裕。再次，在18世纪法国启蒙哲学中，真正对18世纪法国大革命有直接的推动和影响的，即是它的对社会历史问题的说明方面；其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致在革命爆发时“竟给了法国共和党人和恐怖主义者一面理论旗帜，并且为《人权宣言》（作者注：它阐明了新的资产阶级制度的政治原则）提供了底本”^⑤。此外，18世纪法国启蒙哲学在整个西方哲学的发展中借以奠定自己历史地位的，主要也还是在它的对社会历史问题的说明方面；这是它对唯物史观的产生提供理论渊源的最富有光采的地方。由上种种，可见，18世纪法国启蒙哲学是很注重对社会历史问题的研究的。可以说，对社会历史问题的说明，乃是这一哲学的最重要方面。

二、用人的眼光考察社会发展的 根本动力和国家的起源问题

18世纪法国启蒙哲学家对社会历史问题的研究着重于说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和国家的起源等问题。对于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他们都用人的眼光来加以考察。其观点是多元的，概括起来，有如下数种：

1. 人所赖以生存的地理环境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孟德斯鸠是这一观点的著名代表。他在《论法的精神》中认为，“法”即由万物的本性派生出来的必然关系，世界上的一切存在物都有它们的法，自然有自然的法，人有人的法；而“人，作为一个‘物理的存在物’来说，是和一切物体一样，受不变的规律的支配。作为一个‘智能的存在物’来说，人是不断地违背上帝所制定的规律的，并且更改自己所制定的规律”^⑥。这就是说，他在谈论社会规律时，把它和法律（如国际法、政治法和民法等）混淆起来了，认为它是可以制定和废除的。但他接着又强调，这种法律的制定和废除并非是任意的；英明的立法者制定和废除某种政治制度和法律取决于人所赖以生存的地理境环，不同的气候、土壤和疆土形成人们不同的精神气质和内在感情，他们的政治制度和法律也不相同。例如，他认为，北方人生活在寒冷气候下，勇敢刚毅，热爱自由，适合于民主制度；南方人生活在炎热气候下，把懒惰当作幸福，则适合于奴隶制度。斯巴达土壤肥沃，人们生活富裕而怠惰，往往实行贵族政体；雅典土地贫瘠，人们所有无几，唯一值得保卫的是自由，则往往实行民主政体，等等。在西方哲学史上，孟德斯

鸠是倡导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先驱。

2. 立法者的理性或天才人物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这一观点的主要代表是爱尔维修。他以“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的著名论断表达了他不同于孟德斯鸠的社会历史观,认为决定人们的精神、性格、才能和道德的不是地理环境,而是社会环境,即人们生活于其中的经济、政治制度、法律、生活方式、亲友关系等的总和。而在这众多的方面,主要是法律和执行法律的政治制度。他曾根据史实证明说,“各个民族的性格和精神是随着它们的政治形式变化的;各种不同的统治轮流给予同一个民族以高尚的或卑下的、坚定的或轻浮的、勇敢的或怯懦的性格”^⑦。他还说过,“各个民族的兴盛并不依靠它们的宗教纯洁,而是依靠它们的法律高明”,“造成各民族的不幸的,并不是人们的卑劣、邪恶和不正,而是它们的法律不完善”;“法律创造一切”,它“决定我们的行动”,决定我们的精神和道德的面貌。但是,这尚不是爱尔维修上述论断的最终涵义。他在进一步说明政治制度和法律又是如何造成的问题时,强调这完全取决于“立法者的理性”,即其愚蠢和狂热造成不完善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其英明和理智造成完善的政治制度和法律。他由此并引出少数天才人物决定社会发展的结论,如说,“一些伟大的君王在哪里召唤天才,天才则召唤幸福”^⑧。爱尔维修是18世纪启蒙哲学家中最终主张天才史观的哲学家。

3. 人的利益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爱尔维修在他对社会历史问题的论述中,还提出了“自爱”或“利益”的观念。他认为,凡人都具有肉体的感受性,通过它,人能获得快乐或痛苦的感觉;欲望满足了,就感到快乐,否则就感到痛苦。换言之,这种感受性体现了人的一种喜欢快乐、憎恶痛苦的情感,它驱使人们经常地避苦求乐,力图自我保存,谋求幸福。这种情感就叫“自爱”,亦即追求利益的意思;人在各方面追求利益,都是自爱的变形。爱尔维修在这里把利益看作是支配人类一切行动的唯一准则,认为“利益是我们的唯一推动力”^⑨,“人永远服从他的理解得正确的或不正确的利益”;在社会生活中,利益是法律的基础,是道德的原则,也是判断的标准,如“个人利益支配着个人的判断,公共利益支配着各个国家的判断”^⑩。他还把利益提到不可违抗的普遍规律的高度,宣称“如果说自然界是服从运动的规律的,那么精神界就是不折不扣地服从利益的规律的^⑪”。诚然,他所谓的利益观念似是从道德的角度而言的,但其实质的内容乃是指现实的人的吃、喝、穿、住以及爱情、荣誉、权力等等。因此,他的上述思想在关于社会历史问题的考察中就是一种令人注目的理论进展。在18世纪法国启蒙哲学中,象爱尔维修那样热心倡导“利益史观”乃是罕见的。

4. 人的生产力量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猜测到这一重要观点的是哲学家卢梭。卢梭在《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曾详尽地阐述过人类如何从原始的自然状态过渡到文明的社会状态的问题。他指出,人类在发展的最初阶段处于自然状态,在自然状态中人生而自由平等。他们没有工具,没有战争,没有语言,漂泊在森林里,和野兽差不多;各自独立,相互间无依赖和奴役的关系。但是人类是具有“趋于完善”、往前发展的能力的。他们为“保存自己”在与自然界的长期斗争中发明了绳索和钩钩,学会了捕鱼、食鱼;制造了弓和箭,学会了狩猎;还学会了用火来煮肉、御寒,用兽皮来蔽体、护体,用石斧来伐木、筑屋。而随着各种工具的发明,生产和生活能力的提高,尤其是“冶金和农业这两种技术的发明”,人们有了剩余,遂导致了私有制的产生。自那时起,人类便失去了天赋的自由和平等,而处于奴役和统治的社会关系中。在这里,卢梭确认私有制的产生是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人类从原始的自然状态过渡到文明的社会状态的标志。但他同时把私有制的产生和人类从自然状态到社会状态的转变看作是人的生产力量发展的结果。他有这样的名言:“在诗人看来,使人们进于文明同时也

毁了人类的是黄金和白银，在哲学家看来，却是铁和谷物”^⑫。在18世纪法国启蒙哲学中，可以说，卢梭是试图以经济的原因来说明人类社会发展的唯一的哲学家。

18世纪法国启蒙哲学家在社会历史观上用人的眼光企图说明的除上述问题以外，还有国家的起源问题，如卢梭和狄德罗的社会契约论等。他们认为，在社会向前发展的过程中，人们为了战胜困难，保护生命和财富，实现自由和平等，遂有了以契约的形式“结合”起来的意识和行动。当然，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不赞成17世纪霍布斯主张把人们的权力交给一个人或一些人所支配这种实质上是君主专制论的社会契约的观点。如狄德罗主张，人民和君主相互订立契约；君主的权力来自人民，应是有限的。卢梭则认为，社会契约应是人们自由协议的产物，缔结契约的每个人必须把自己的一切权利转让给全体；这不是上者与下者之间而是“共同体”与其各个“成员”之间的一种约定。由于共同体是由各个成员组成的，因此这种约定亦即是“人民是同自己在订立契约”。他强调，在这契约中人们虽然丧失了自然的平等和自由，却获得了契约的平等和自由；这是更高级的社会的平等和自由。在这里，根据契约而形成的全体就是国家，而缔结契约者则为公民。卢梭说，“我们要经常记住，社会契约论是一种特殊性质的契约，这就是说，人民作为整体来说就是主权者”^⑬。他的观点比狄德罗的观点更激进。在18世纪法国启蒙哲学中，卢梭就是因提出社会契约论，用人的眼光系统地考察国家的起源问题而闻名于史的。

三、十八世纪法国哲学人本主义的“启蒙”特征

综上所述，可见，18世纪法国的那些十分注重社会历史问题的哲学家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问题上，其观点具有多元性，并且都是从人出发来加以考察和说明的：如用人所赖以生存的地理环境，或用人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环境；在谈论社会环境时或突出人的政治法律因素，或突出人的理性因素，或突出人的利益因素、人的生产力量因素等。此外，他们还用人与人之间订立社会契约来说明国家的起源问题等等。正是基于这种从人出发来说明社会历史问题的事实，所以18世纪法国启蒙哲学的社会历史观本质上属于人本主义范畴。又由于他们都把人看作是“自然的一种产物”，是“一部机器，为肉体的感受性所发动，必须做肉体的感受性所执行的一切事情”^⑭，因此上述观点从一定意义上说乃是他们把自己的唯物主义学说应用到社会生活方面的尝试和表现。

但是，真正说来，18世纪法国启蒙哲学家所谓的人乃是人的抽象的存在物，它们不具有现实的社会性；乃是“智能的存在物”，支配它们的是“永恒的理性”。而他们所据以说明社会历史发展的人的理性、天才、自爱、利益和生产力量等也只是这些抽象的人的永恒的普遍的“人性”而已。例如，爱尔维修曾说过，“自然从我们幼年起就铭刻在我们心里的唯一情感，是对我们自己的爱。这种以肉体的感受性为基础的爱，是人人共有的”^⑮。在他看来，人人都具有肉体的感受性；而自爱或追求利益是以人的肉体感受性为基础即是人的肉体感受性的直接后果，因此它们也就是人的一种永恒的普遍的本性。这即是说，18世纪法国启蒙哲学家完全是从生物学观点自然主义地来考察人和人性的，他们把人和人的利益等等一概地抽象化了。这当然不是偶然的，如马克思所说，在历史上，企图代替旧统治阶级的地位的新兴资产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公共利益，抽象地讲，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⑯。这说明，18世纪法国启蒙哲学家的社会历史观乃是以人性论为理论基础的。从这种人性论出发，他们谈论着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问题，

谈论着“自然法”、“自然权利”、“自然状态”、“社会契约”、“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和“利己主义”等等一系列有关社会政治伦理思想的范畴；企图把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本性、利益和事业冒充为全人类的本性、利益和事业。这种抽象的人性论对于劳动人民来说就具有极大的欺骗性。直到今天，也都还有它的影响。

18世纪法国启蒙哲学在社会历史观上的人本主义是文艺复兴时期宣称“我是人，人的一切特性我都具有”的人文主义的继续和发展。一般说来，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注重从感性的角度研究人；强调人的本性中的情感、意志等方面；主要通过文学、艺术、伦理思想领域来描绘和表现人。而18世纪法国哲学人本主义则注重从悟性的角度研究人；强调人的本性中的理性方面，认为“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①7}；主要通过社会历史政治思想领域来描绘和表现人。无疑，这比前者对人的研究要深入了一大步；由此也才有后来从更抽象的即哲学的角度来研究人、把人作为哲学的最高主题的德国古典哲学人本主义的产生。

在这里，需要着重说明，18世纪法国哲学人本主义比之以往的人文主义具有更高层次的“启蒙”特征。这种资产阶级的“启蒙”特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它在社会历史问题上用理性彻底地批判宗教神学，最终具有和战斗的无神论相结合的性质。综观18世纪法国哲学人本主义的著作，我们看到，它们之从人出发，说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和国家的起源问题，其矛头是直接地指向当时封建专制制度的精神支柱——天主教的神学史观的。例如它们宣传人所赖以生存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宣传人的利益是社会的唯一推动力，以至宣传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契约论等，就是为了反对上帝无时无刻不在安排和干预尘世生活，人的利益在天堂、来世，以及著名的君权神授论等等在当时具有广泛影响的诸神学谬论的。不仅如此，它们还有以犀利的笔锋生动而机智地揭露和批判宗教神学本身的无神论文献；这些无神论文献乃是18世纪法国哲学人本主义社会历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被誉为“上帝的个人的仇敌”的霍尔巴赫在其《袖珍神学》和《健全的思想》等名著中就曾系统地分析过宗教的起源和本质，指出“无知和恐惧”是宗教的两个滔滔不绝的来源，上帝是人所想象的“虚构物”；就曾揭露过宗教的祸害，认为宗教如“神圣的瘟疫”，它挑起尘世间的战争，败坏人类的道德，宣传愚昧，扼杀科学，帮助专制制度奴役人民，是万恶之源。此外，他还把启迪人的理性，普及科学知识，视为克服宗教的唯一途径；驳斥过所谓“人民需要宗教”的陈词滥调，等等。

简言之，18世纪法国哲学人本主义用理性反对了愚昧、偏见，促使人们从宗教神学所造成的精神压抑下觉醒起来，沉重地打击了当时盛行的僧侣主义。这是它具有典型的资产阶级“启蒙”特征的鲜明标志，这也是它显著地优越于前此的人文主义和17世纪的唯物论的地方。

第二，它在社会历史问题上用理性无情地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具有和公开的现实性相结合的性质。综观18世纪法国哲学人本主义的著作，我们看到，它们是当时法国内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封建专制制度、以资产阶级为首的第三等级和封建贵族等社会矛盾激化的直接结果，其历史任务也就在于为法国即将到来的革命作舆论准备。因此，它们不仅是反对现存的宗教神学和17世纪的形而上学的斗争，而且还是反对现存的政治制度的斗争。它们之从人出发对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和国家的起源问题的说明，本身就是法国资产阶级进行这种斗争的需要和表现。因为，如马克思所说，“君主政体的原则总的说来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哪里君主制的原则占优势，哪里的人就占少数；哪里君主制的原则是天经地义的，哪里就根本没有人了”^{①8}。实际上，从这些著作中能推论出许多资产阶级的革命性结论。例

如, 爱尔维修在谈论利益观念时, 公开反对“小集团利益”即封建贵族和僧侣阶级的利益, 把它看作是法国社会发展必须割除的“毒瘤”; 提倡“把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紧密地结合起来”。而他所高举的维护“公共利益”的旗帜, 肯定了资产阶级有享受自己的物质利益和幸福的权利, 就是一面向整个第三等级呼唤反对专制制度的革命的旗帜。又如卢梭在谈论社会契约的观念时, 断然以“人民主权”的概念否定“朕即国家”的封建专制制度的合理性, 提倡契约的自由和平等。而他所向往的理性国家在理论上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自由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和商品等价交换的关系, 在实践中就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 等等。

简言之, 18世纪法国哲学人本主义以抽象观念的形式“表现出废除旧制度的必要”。它用理性直接批判了封建专制制度, 促使人们从这种制度所造成的社会压抑下觉醒起来, 沉重地打击了当时占统治的封建主义。这是它具有典型的资产阶级“启蒙”特征的又一标志, 这也是它显著地不同于前此的人文主义和17世纪的唯物主义的地方。

18世纪法国哲学人本主义具有上述典型的启蒙特征, 乃与当时法国新兴资产阶级的经济、政治力量已强大到必须也能够推翻封建专制制度的地步有关, 也是与它忠于一切自然科学, 从世界本身说明世界的唯物主义自然观相适应的。历史地看, 可以说, 18世纪法国哲学人本主义“是法兰西精神在形式上和 content 上迄今最高贵的成就”^⑩。它“有血有肉, 能言善辩”, “文明化”了, 成为资产阶级公开战斗的思想武器, “具有真正法国的性质”^⑪; 在理论上乃是近代西方哲学人本主义发展中的重要阶段。

四、蕴含有一系列宝贵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

如前所述, 18世纪法国启蒙哲学在社会历史领域里虽然尝试着运用唯物主义学来说明问题, 毕竟离开了人的社会性抽象地来考察人和人性, 是以人性论为理论基础的。这种对人的研究, 从总体上说不懂得物质资料生产活动是人性变化和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漠视理性、利益、法律、政治等概念的社会经济内容; 还认为“人是机器”, 人在他生存的每一瞬间“都是在必然性掌握之中的一个工具”, 即把人的一切都看作机械地受因果规律所制约, “没有一刻是自由的”^⑫。这就使它最终不得不从意识方面(即使是卢梭最终也没有摆脱从这方面)去寻找社会发展的动力, “而不去研究隐藏在这些动力后面的是什麼, 这些动力的动力是什麼”。^⑬这说明, 18世纪法国启蒙哲学是“半截子的唯物主义”, 即在自然观上坚持机械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 在历史领域内则“自己背叛了自己”, 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的泥潭。

但是, 18世纪法国启蒙哲学家作为新兴的进步的资产阶级学者, 怀着“对真理和正义的热诚”, 在社会历史领域里所作出的理论贡献是不可抹煞或低估的。首先, 他们在以人性论为理论基础说明社会历史问题时, 虽远未使社会历史观成为科学, 却把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神创造和支配人, 创造和支配社会, 创造和支配一切的神学史观转向了对人的注重和对人与人关系的研究的人学史观, 力图把社会历史观从神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这本身就是社会历史问题研究中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的进展, 是向科学的唯物史观发展中的一个必要的历史环节。

其次, 他们在从人出发多元地说明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问题时, 如同以往的“社会学”和“历史学”一样, “至多是积累了片断收集来的未加分析的事实, 描述了历史过程的个别方面”; 但这毕竟是在历史上第一次广泛地展开了对社会发展动力问题各个侧面和因素的探讨, 诸如人所赖以生存的地理环境, 理性, 法律, 政治制度和人的物质利益等等。而恩格斯说过, “根据唯物史观, 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

马克思和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②。至于卢梭试图用经济原因来说明社会发展的观点（虽然尚缺乏史实作根据，是不科学的假定），则更是一种值得注重的有价值的历史唯物主义萌芽了。

第三，他们在批判封建制度和宗教神学时，在社会历史问题方面还能够写出“辩证法的杰作”；我们只要提一下狄德罗的《拉摩的侄儿》和卢梭的《论人间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就够了。这些辩证法的杰作通过塑造法国下层社会里一个在性格上和思想上极为矛盾的无赖汉的典型，和论述人类从原始的自然状态到文明的社会状态的过渡等，显露出了马克思所使用的一系列辩证的说法：“按本性说是对抗的、包含着矛盾的过程，每个极端向它的反面的转化，最后，作为整个过程的核心否定的否定”^③等等。这些早于黑格尔运用的“矛盾辩证法”思想，使得他们对社会历史问题的认识和研究比之前人要深刻得多。

此外，他们在把洛克的唯物主义思想运用于社会历史问题时，还包含有许多引人注目的思想。如关于人性本善和人类智力的天然平等，关于经验、习惯、教育的万能，关于外部环境对人的影响，关于理性的进步和工业的进步的一致，以及关于个人的欲望、享乐、利益的合理性等等的学说。这些“唯物主义学说，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④后来19世纪的法国和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把它们作为逻辑基础加以发展了，从而“直接汇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总流”，成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财产。

综上所述，可见，18世纪法国启蒙哲学人本主义社会历史观，乃是在19世纪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辩证的唯心史观之前内容最系统和观点最新颖的一种社会历史学说。它蕴含有许多宝贵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正因为这样，马克思在1843年旅居法国巴黎期间就曾投身于法国启蒙哲学文献的潜心研究，积累了丰富的材料和深刻的论点，为他的科学的唯物史观的创立提供了直接的理论渊源。

在18世纪，法国启蒙哲学人本主义社会历史观是法国大革命的直接的前导。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和法国启蒙哲学以其对世界的发展和哲学的发展的巨大推动和深远影响，“使十八世纪成为主要是法国人的世纪”^⑤。

注释：

①②⑤⑦⑨ 恩格斯《反杜林论》第338、14、338、14、138页。

③④②②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第162、165、165、166页。

⑥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第3页。

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 《十八世纪法国哲学》第502、477、537、458、460、156—157、499、501页。

⑬ 卢梭《爱弥儿》下册第709页。

⑯⑰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4页，第1卷第411页。

⑱ 《马克思恩格斯论宗教》第112页。

⑲ 霍尔巴赫《自然的体系》上卷第71、168页。

⑳㉑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4、477页。

㉒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85页。